

中国管理学术生态的演化

——过程理论视角的历时性研究

王凤彬 安百宇 刘露露 李 彬

[摘要] 如何避免陷入域内过度竞争窘境、推进实质性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以中国管理学界为典型案例开展过程研究，从多方主体间主动或受动的促进与制约关系出发，构建一个体现时空多维性、复杂性的学术生态系统模型，从“关系—过程论”角度剖析学术域内过度竞争的成因及解决之道。基于中国管理学界历时性演化的过程分析显示，学术生态系统具有产生自发秩序的自组织特性，正、负关系交织使得整个系统能够在当下借助负反馈机制实现稳定性，而未来又可通过前置要素由隐而显的复现过程克服潜存的锁定而实现螺旋式发展。将深蕴整体观、动态观和辩证观的中国传统过程哲学思维用于阐释学术域内过度竞争产生与消解的过程及态势，揭示系统在要素互动中产生内在动力的过程机制，可以为复杂动态现象研究注入中国智慧，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 管理哲学；学术生态；演化；过程哲学；历时性研究

一、研究背景和基础

中国管理学界是一个充满活力、变化纷呈的学术领域。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人员意识到，中国管理学界正面临着学术域内竞争愈演愈烈的局面。域内竞争过度会引发个体努力的无效化，其结果是排除了真正学术创新和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学术探索。学术研究成果也因此愈加短效化，只见成果发表“量”的膨胀，罕见“质”的提高。域内过度竞争将严重影响整个领域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个体和整体都造成一种不必要的损耗。因此，针对特定域内过度竞争现象，探究其发展变化的动态性与驱动机制，避免陷入“内卷化”窘境，成为当前学术演化过程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学术域内过度竞争虽然是当下热门话题，但是从学理上对此状态的成因及出路的探讨却鲜见，且既有研究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和片段、局部的原因分析上，很少系统地关注学术生态中的多方参与者互动中引发的关系格局变化及其历时性成因，深入揭示动态现象内蕴的过程机制则更为少见。相关文献指出，学术内卷化跟学术自身生态紧密相关，需要从生态的角度理解和防止内卷化倾向。^①

作者：王凤彬，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哲学与组织生态研究中心主任，wangfengbin@rmbs.ruc.edu.cn；安百宇，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abyyy@ruc.edu.cn；刘露露（通讯作者），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liululu18811310353@163.com；李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erwailibin88@126.com。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企业裂变式发展重大问题研究”（21&ZD136）阶段性成果。

① 成伯清：《学术的悬浮化及其克服》，载《探索与争鸣》，2019（4）。

科研工作者只是学术生态系统的参与者之一,其行为受到学术系统其他参与者以及整个生态的影响。从行业变迁的角度看,进入成熟期的行业难免会因域内参与者过于密集而出现内部过度竞争,从而引发内耗。然而,从演化过程论角度看,这只是特定行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因为同质化竞争过于激烈而产生的一时困境,背后蕴含着某种触发此现象产生的驱动力以及消解的趋向性。陷入洪流中的个体虽然难以脱身,但是洪流的产生与走向却是可以规制或避免的,关键是从宏观层面上识别和把握动态现象演化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采取针对性的方略去引导和管理其变迁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进行战略谋划时明确提出并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①。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内容,注重从事物的总体与全局、从要素的联系与结合上研究事物的运动与发展变化。系统观念启发研究者要摒弃还原论、实体论视角,将发起或接受关系的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视为互动的主体。这些主体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在系统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和演化。面对要素间存在复杂关系的现实,单纯考虑系统某一参与方或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时刻,都无法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引发域内过度竞争这类动态现象的生发机制,更难以探寻出避免恶性循环、促进良性循环^②的整体性方略。

本文秉持系统观,认为中国管理学界是一个内置竞争性的学术生态系统,对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变迁过程进行案例研究,提炼出有关学术生态演化的过程理论化模型。当前,“学术生态”一词虽已出现在一些文献中,但关于其学术性定义及构成要素尚未形成共识。有文献认为,学术生态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为达到学术创新的目的而进行复杂的学问探究活动的生态系统。^③ 管理学界作为高校群落下的一个次级群落,是由工商管理领域的知识分子为主体而形成的致力于相关教学与科研活动的生态系统。注重以人类为行动者的研究文献指出,学术生态群体由不同的学者群体构成,他们遵循共同的规则,通过不同专业化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机制建立起内嵌信任和晋升制度的专业系统,形成了学术系统的差序格局。^④ 学术生态系统兼具共性上一致与个性上灵活的两面特性,即学者个体按照个人意识开展学术活动,集体则将个体的共同意识和价值准则加以提炼,形成个体与集体的双向互动。^⑤ 与此同时,持“关系—过程观”的学者却主张,活动系统的构成主体并不仅仅限于人类,还囊括了其他的、非人类的行动者。而不论何类行动者,只要是某一作用过程的介入者,与他者产生了某种相互影响,都可以成为“主体”(agent)。这样以介入相互关系的过程来界定“主体性”及其承载者,无疑会使研究具有更广阔的视域。^⑥ 本文采用后一种观点,将学术生态系统定义为一个包含多方参与者的复杂系统,这些参与者(广义的主体)涵盖现有学术从业者努力(简称“从业努力”)、工作成果、奖酬结构、同仁群聚及之后形成的竞争压力以及多方互动中涌现出的愿景目标等多元要素。

这些要素并非单独存在,而是作为系统组元彼此交互,即作为特定系统的参与者相互之间存有互动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这些关系之中的主体,便可概称为“关系者”。“关系者”之间的互动对于整个学术生态的演化具有内生性作用,是揭示系统演化内生动力必须全面考量的动因,也是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117页,外文出版社,2022。

② L. L. Putnam, et al. "Contradictions, Dialectics, and Paradoxes in Organizations: A Constitutive Approa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6, 10 (1): 65-171.

③ 杨移贻:《知识经济时代的学术生态》,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S2)。

④ 卢盈:《学术场域的精英主义迷思与学术生态系统的优化》,载《大学教育科学》,2022(4);卢盈:《学术系统的“差序格局”及其治理》,载《江苏高教》,2022(2)。

⑤ 李胜会、徐文燕:《学术生态如何善治?——基于个体与集体关系的视角》,载《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

⑥ K. Sele, and S. Grand. "Unpacking the Dynamics of Ecologies of Routines: Mediators and their Generative Effects in Routine Interactions".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6, 27 (3): 722-738.

化解域内过度竞争现象的突破点。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蕴涵丰富的关系与过程思维，可以为动态复杂现象的阐释和化解提供新思路。特别是道家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① 道家强调以整体观和动态观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主张整体是由“关系”构成，整体中的任一要素都有与它联系着的四个方面：对于任何焦点要素来说，都有施（主动）——受（被动）、生（正）——克（负）四种关系。这些关系常常是非线性的、复杂的，具有多态（促进或制约，标识符号具体是促进时为“+”，抑制时为“-”）且多向（促进关系上的主动或受动为“→”或“←”，制约关系上的主动或受动为“—●”或“●—”）特性，从而形成四元关系者，它们与焦点要素共同构成一个五元的系统，即“五行”。道家学说是一种承载本土特色的过程思维，其关于系统中固有的生、克关系及其组合的洞见，与主张“统一中有对立，对立中有统一”的辩证矛盾观相契合^②，有助于深刻理解和解释宇宙万事万物的生成与变化，需要在当代问题研究中予以体现和继承。

本文秉持融通中外文化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研究立场与学术目标，从同一系统内部多方主体间主动或被动的促进（生）与制约（克）关系出发，以中国管理学界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构建一个包含人类和非人类主体的学术生态系统模型，从整个系统演化角度剖析学术域内过度竞争的产生和影响，归纳提炼出关于此类动态现象的成因、发展轨迹和化解方略。

二、关系建构下的动态现象研究

（一）学术生态系统中多方互动关系特征

学术域内过度竞争之所以出现，可能源自如下的过程：越来越多同仁的加入，不断刺激现有从业者付出更大的努力，但往往水涨船高，收效难显（同仁群聚——●从业努力）；在激烈竞争中艰辛胜出的少数学者不免要设法获取和掌控资源，其直接后果是影响稀缺资源分配的均匀性与公平性（从业努力——●资源分配）。紧接着，学术“山头”出现，各个“自成一派”的学术群体阻碍了学术社群构成的多样性与人员及思想的流动性（资源分配——●同仁群聚）。这种向少数优胜者倾斜的学术资源分配模式，引致了学术霸权主义，后来者往往是自愿或不自愿地遵循现有模式，这一过程的结果是既有从业者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由此形成一种难以突破的“恶性循环”。

大众耳熟能详的“石头、剪刀、布”游戏^③，生动地展现了三元关系中如何产生“恶性循环”局面。石头击败剪刀，剪刀击败布，布又击败石头，这一循环式关系使得其中任何一种策略都被锁定在无休止的“怪圈”中，难有某一元可以绝对地胜出。从关系模式的角度看，如图 1a 所示，“石头、剪刀、布”是由三个负向（相克）关系内置于系统的、封闭的负反馈^④循环，稳定性有余，但发展性不足，会产生“锁定”局面。

破解潜存的窘境，需要在三元间相克关系的基础上引入或创造出必要的相生关系。以前述的“资源分配”要素为例，可将之比作图 1a 中的“布”，它被“剪刀”（如 D，从业努力）所克。但是，如果“布”要素的特质发生变化，比如，首先转变成“布块”（E，如后文识别出的工作成果），它不是通常认识的会被“剪刀”碎片化（“克”代表此破坏作用）的布料，而是有一定面积的

① 熊铁基：《重视对道家思想中生态智慧的研究》，载《人民日报》，2018-07-24。

② 周宝玺：《矛盾规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③ 兰·费雪：《石头、剪刀、布：趣味博弈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④ 负反馈的概念来源于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意指如果反馈信息与控制信息作用方向相反，则利于维持作用物与被作用物关系的稳定以及整个系统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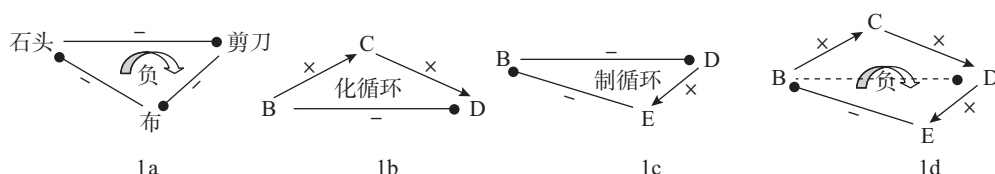


图1 三元关系格局和相异的两个三元循环及其结合成的四元循环^①

块状布，该“布块”可用以包裹住对“剪刀”施克的“石头”，从而使“剪刀”所受的克力消失或弱化，由此便构成图1c的结构；其次，再由“布块”衍生出能相生“石头”这硬物的某要素（A，如后文识别出的奖励结构^②），该要素本身又受“剪刀”所克，由此也形成形状类似于图1c的结构。这两个三元关系体，在功能上都为“2克1生”的正反馈结构，不同于之前的“石头、剪刀、布”是由“3克”构成的负反馈结构。解构单纯克功能的“布”，形成均具有生与克双重作用的E和A二元要素之后，若进一步引入介于“石头”（B）与“剪刀”（D）这一对立面之间的中介要素C，那么就可以构建出如图1d所示的四元关系体。统揽图1中的各个子图，可以发现有两个不同性质的三元组，其一是“2生1克”的“化循环”（图1b），另一是“2克1生”的“制循环”（图1c）。进一步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构成的四元关系体（图1d），是一个负反馈结构，其功能是借助E对B这个克者的反克，使得要素D不再强烈受制于B。

本文以带有箭向与作用方式的“→”和“—●”符号，分别表示生（正向关系符号“+”，促进作用）与克（负向关系符号“-”，抑制作用）两种不同的关系。“五行”系统（五元要素构成的小型复杂系统）是由5个相化的三元循环和5个相制的三元循环（共10个次级三元循环）重叠嵌套而成的系统。^③这两类三元循环，可分别以图1b和1c来形象地表达。其中，图1b是“化”循环，意指B对D的克力被C的生力所化解，即受克者被生；图1c是制循环，意指B对D的克力被E的克力所克制，即克者被克。在化循环中，克力的存在使D的成长有一定的限制，从而形成有界的生长；而制循环有如催化剂一般，推动着化循环的顺利进行。这两个相异的循环，具有互补的可能性。

将“化”与“制”两个循环结合起来，由此得到一个如图1d所示的四边形闭合循环，以之来考察某一循环中特定“质料”生成及“催化”相结合的过程。^④其中，B—●D是这两个三元循环共同的边，质料D是在这一循环中产生了新特质的“成者”（生成物）。三元制循环是一个由“1正（+）2负（-）”构成的正反馈循环，是具有自我强化特性的催化剂；而四元构型则是一个由“3正（+）1负（-）”构成的负反馈循环，具有稳定性，能够持续地化生出“成者”（D）。在四元循环中，B、C、D、E依次扮演了生者、中介者、成者和催化者角色。这种本土视角研究具有启发性，但结论仅在双案例“比同”中得出，缺乏对每个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足够长的演化历程探究。从原理上说，揭示复杂事物发展变化律则的真正过程研究需要足够长的时间线，以便形成一个将各时点以独特方式聚合起来的动态体系，阐释事物发展和变化规律。

① 图1a整理自兰·费雪：《石头、剪刀、布：趣味博弈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图1b至d来自两个三元循环及其结合而成的四元循环的模型构建原理。

② “奖励结构”反映了对已有工作成果的事后追认。相比三元关系中“资源分配”作为事先的投入容易受权力关系主导而缺失客观性，抑制门派之外的人员流入，基于成果公允地进行激励可以促进多样性同仁的群聚。当然，基于可见成果的奖励易于触发短期化行为，可能影响学术群体追求更长期的、愿景性目标。

③ 李曙华：《系统科学与中医理论的现代重建》，载《系统辩证学学报》，2005（1）。

④ 王凤彬等：《企业组织变革的动态演化过程：基于海尔和IBM纵向案例的生克化制机理的探讨》，载《中国工业经济》，2018（6）。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关系分析是探寻复杂动态现象演进动力的关键。关系是指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不同于还原论和互动关系论主张实体是第一位且相对不变的，交互作用关系论（transactionism）强调关系各方是相互生成的，认为关系是第一位的，实体是关系的“结节”，关系先于关系者，而且关系者与关系环境内在于彼此，就像大海和水滴的关系，无此则无彼，相容则无间。^① 相较元素或要素分析，关系分析难度更大，但更贴近复杂动态现象的本质。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在将事物作为复杂现象进行分析时，我们关心的是元素之间关系的模式。抽象的、生成的模式是复杂性的关键。”^② 他主张社会（经济）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动态发展和改变的自组织系统，为揭示此复杂系统“自发秩序”之源，需要从“关系的模式”而不是单个元素切入，并且阐发的主题应该是一种多元互动中生成过程的涌现性，而非传统依赖所谓“全局控制者”的计划性。^③ 哈耶克强调了自组织原理的重要性，但仅仅提供了系统要素间关系的一般化说明，把社会行为秩序理解为一种自发组织和自我调节的复杂现象，这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静态的解释。哈耶克虽然认识到自发秩序可能是由它所经历的某特定系列的环境所形塑的，但他所指的系统与环境通常是从空间意义上界定的，即把处于系统边界之外的因素定义为“环境”，忽略了时间性境域下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体考量。

时间维度必须与空间维度一起纳入自组织过程研究中，才能刻画系统整体演化进程的连续性与变异性。就某一时刻来看，形塑系统演化进程的结构往往包含系统所经历的环境的一个确定的顺序。阐明这样的时间顺序，是“强过程导向”研究不可避免的核心议题。^④ 从关系模式到自组织过程，显示了采取单一的、静态的关系研究视角和方法的缺陷。关系是如何在时间进程中展开的，以及展开的动力机制是什么？都是亟待回答的重要研究问题。鉴于此，本文从系统演化的角度，引入道家思想中的生克、循环和否定等中国文化核心概念，并结合辩证矛盾问题分析中的“关系—过程”研究方法，系统深入地探讨系统及其参与者如何摆脱三元相克关系格局中固有的恶性循环，揭示域内过度竞争产生和消解背后蕴含的系统内在演化机制。

（二）否定之否定规律和“关系—过程”理论视角

黑格尔辩证法体系的基本结构是否定之否定，也即“正题、反题、合题”。否定之否定规律是通过“三段论”或“一分为三”逻辑阐发矛盾发展的途径或轨迹。矛盾通过两次否定实现自身转化：第一次否定产生对立面（正与反）；第二次否定则使对立面达到统一（合）。^⑤ 学术生态不同发展阶段之间，或许也存在类似于否定之否定的机制，实现学术生态的发展。但是，如王俊龙指出的，“一分为三”论在逻辑上并不完善，正与反是变化的条件，分与合是变化的过程，黑格尔的“合”缺少了作为其对立面的“分”。^⑥ 这是关于阶段之间关系的陈述。进一步，在特定发展阶段内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例如关系的强弱、方向等，也会影响学术生态的走向，因此，引入“关系—过程”理论视角可能更具有普遍意义。为此，需要在有别于互动关系的更广泛的时空绵延中分析社会行为的系统特征。鉴于关系既有共时性，又有历时性，因此研究者应该同时关注系统内部在空间结构上的构成复杂性和在时间维度上关系体得到形塑的过程性。^⑦

① 季玲：《论“关系转向”的本体论自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1）。

② E. Feser.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ye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 F. A. Hayek.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④ A. Langley. "Process Thinking in Strategic Organization". *Strategic Organization*, 2007, 5 (3): 271 - 282.

⑤ 彭燕韩：《论黑格尔辩证法体系的缺陷与中国特色辩证法体系的创新》，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6）。

⑥ 王俊龙：《太极数理哲学：身心统一的世界观》，载《学术月刊》，2013（6）。

⑦ 肖瑛：《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9）。

过程哲学把世间万物包括时间都看作是一个过程性的存在,强调实体是经由过程展现的,过程是理解实体的最好方式。^①所谓“存在”之物,不过是动态过程中的短暂性产物,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在当下实例化的结果。^②因此,应该以“相互依存的要素的复杂异质性”来理解各个时点上的现实,这样才能探寻到特定事件发生中所蕴含的生成力。过程哲学家强调,“现在”是一个与过去、未来相对的概念,在任何时刻作为“显现真实”存在的成者,并不仅指某种已生成的事物或状态,而是在一种开敞展现过程中的“见(xiàn)在”或“显现”。要洞察这样的“显现真实”,需要观察者秉持一种时间性境域。范德文(A. H. Van de Ven)指出,事物发展的前后过程之间可以通过相互联系和影响,实现“汲取式前行”(conjunctive progression)^③,但是并没有具体说明前后过程以什么样的方式相互影响。因此,将“关系性”和“过程研究”相结合,对学术生态多方主体间关系的模式进行过程性考量,理解多元互动中生成过程的涌现性,或许可以为过度竞争现象提供新的视角和洞见。

与西方过程哲学家以“绵延”概念刻画事物变化发展过程的不可分割性类似,中国先哲们提出以反映五元要素之间相生与相克交织关系的“五行学说”来刻画“行变”的动态过程。五行体系作为时空结合体,代表了空间广延性和时间连续性的统一,凝练了“过程论”的基本理念,体现了“关系—过程”视角的有机结合,是一种朴素的生成整体论。^④

三、中国管理学术生态发展阶段与路径特征

本文采用深度单案例研究方法,以中国管理学界为研究对象,沿时间线纵贯分析其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至2022年的发展历程。经过对45年来中国管理学界发展历程中所涉及的具有生克(关系质)以及施或受(关系方向)特性的系统组元(关系者)的梳理与归纳,本文识别出包含愿景目标(C)、从业努力(D)、工作成果(E)、奖酬结构(A)、同仁群聚(B)5个要素的系统结构^⑤。具体发展阶段与路径特征提炼为表1。

表中第一列刻画学术生态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以描述和反映特定要素生成(特质更新)过程所包含的生克关系组合,即由3个表示相生(+)的“→”和1个表示相克(−)的“—●”两类关系箭号所构成的关系集。第二列是基于“时序区分”策略^⑥对演化过程各个阶段蕴涵的关系律则的归纳(表现为四元闭合的循环),并以该阶段获得新特质的“成者”(表1第二列中以字母右下方的自然数表示系统所处的阶段,成者以粗体字母显示)来刻画关系形态特征。第三列是在阶段特征概括的基础上,提炼出主题并赋名。第四列是以学术域内竞争为关注点而对整个生态系统演化所经历阶段的大类区分,包括域内竞争强化、竞争过度 and 竞争常态化三大阶段。

① 孙新波:《“整合分合”认识论域下的企业家管理思想解构的方法论》,载《管理》,2021(1)。

② R. A. Burgelman, S. W. Floyd, and T. Laamanen. “Strategy Processes and Practices: Dialogues and Intersect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29(3): 531–558; C. Cloutier and A. Langley. “What Makes a Proces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rganization Theory*, 2020, 1(1): 1–32.

③ A. H. Van de Ven. “Engaged Scholarship: A Guide for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④ 邢玉瑞等:《中医五行模式的逻辑缺陷探讨》,载《中医杂志》,2019(2);谭清华:《从阴阳五行说看道教学宇宙生成观及其生态意义》,载《社科纵横》,2016(10)。

⑤ 这一包含5个要素的学术生态系统模型的构建,是出于对系统完备性和简洁性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完备性是指所包含要素要全面,5要素模型包含了与任何焦点要素所有可能的相互作用(4种,包括正与负的“施动”、正与负的“受动”)的关系者,加上焦点要素本身,则为5要素。简洁性是指所包含要素要尽可能少,5个以上要素模型的构建,实际上都可以简约为由若干个5要素模型相互叠加而成,而5个以下要素模型的构建,不符合完备性原则。

⑥ A. Langley. “Process Thinking in Strategic Organization”. *Strategic Organization*, 2007, 5(3): 271–282.

表 1 中国管理学界学术生态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跨阶段演化的历程

关键证据	系统要素间关系形态	阶段特征
初始阶段以编写和引进教材为主。自 1977 年 10 月恢复高考后，培养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国家建设人才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激发了大批高校教师投身教育事业（愿景目标→从业努力）。教材缺乏是恢复高考后亟须解决的问题，于是高校教师通过出国进修、引进或自编，出版了一系列教材（从业努力→工作成果）。与之对应的是鼓励教材编写的奖酬结构（工作成果→奖酬结构）。重视教材建设的奖酬结构推进了高等教育的规范化建设，但并没有起到激励个性化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培养高水平人才这一愿景目标的实现（奖酬结构→愿景目标）。	① $C_0 \rightarrow D_0 \rightarrow E_0 \rightarrow A_0 \rightarrow C_0$	既定模式形成前夕 学术域内竞争强化
第①阶段致力于打造“精英”教育模式。随着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师范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关注教材编写与规模化教育的奖酬结构吸引了大批青年教师（奖酬结构→同仁群聚）。随着教师规模扩大，教师们在日常交流中逐渐产生了用科学严谨的方法发展知识、并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和企业家的共识，“精英”教育模式的愿景逐渐成形（同仁群聚→愿景目标）。高校教师开始反思单纯通过课堂上传授知识这一形式能否真正打造中国的精英教育模式（愿景目标→从业努力）。从业者的反思和转型与原本强调教材编写和规模化统一培养的奖酬结构之间产生了张力（从业努力→奖酬结构），加速了“精英”教育模式的进程。	① $A_0 \rightarrow B_1 \rightarrow C_1 \rightarrow D_1 \rightarrow A_0$	
第②阶段强调教材质量与教学特色。从业者的反思使其开始钻研教学的模式和方法，中国教育模式的教材体系开始形成（从业努力→工作成果），注重优质教材和高质量教学的奖酬结构得以确立（工作成果→奖酬结构）。在这种奖励机制下，具有教书育人的理想和抱负的同仁不断加入教师队伍中（奖酬结构→同仁群聚）。同仁聚集引致的教师社群密度的提高充实了中国的教育体系，但也直接导致了教师内部互相竞争，使现有教师不得不加快提升自身教学能力（同仁群聚→从业努力）。从业者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打造了中国特色教育模式，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强调教材质量与教学特色的奖酬结构最终形成。	② $D_1 \rightarrow E_1 \rightarrow A_1 \rightarrow B_2 \rightarrow D_1$	
第③阶段教研结合。随着教师队伍的壮大和教学经验的丰富，高校的学术氛围日渐浓厚，在强化教学的同时增强科研能力逐步成为学术界的愿景目标（同仁群聚→愿景目标）。高校教师开始尝试教研相结合的发展之路，将科学研究作为教学材料的补充和丰富（愿景目标→从业努力）。论文发表逐渐成为彰显高校教师知识创造能力的体现，越来越多的教师努力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形成“教材+论文”复合成果（从业努力→工作成果）。复合型成果对教师能力有更高要求，同仁加入学术生态的门槛随之提高（工作成果→同仁群聚），从业者整体素质遂得到提升。	③ $B_2 \rightarrow C_2 \rightarrow D_2 \rightarrow E_2 \rightarrow B_2$	同仁群聚密集化 学术域内竞争过度
第④阶段同仁跟进。21 世纪初，国内学术界尚处于论文发表的早期阶段，期刊经常采用约稿的方式获取名师大家的科研成果以提高自身的声望和地位，催生了注重论文发表的奖酬结构（工作成果→奖酬结构）。以科研成果为主的奖酬结构吸引了青年教师，他们大多依循英美主流的以实证分析为主导的方法或范式从事科学研究（奖酬结构→同仁群聚）。随着师资队伍进一步扩大，做好科研、发表论文逐渐成为学术生态的愿景目标（同仁群聚→愿景目标）。原本教研结合的工作成果中的教学部分不断被弱化，科研论文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愿景目标→工作成果）。社群密度逐渐增大，是学术域内过度竞争的开端。	④ $E_2 \rightarrow A_2 \rightarrow B_3 \rightarrow C_3 \rightarrow E_2$	

续前表

关键证据	系统要素间关系形态	阶段特征
第⑤阶段“象牙塔”式研究成果，只注重方法的严谨性，不注重实践关切性。以科研为主的愿景目标激励现有研究者努力跟随西方的主流研究方式（愿景目标→从业者努力）。他们看到了高产带来的红利，更加注重方法的技巧性，忽视了研究的可复制性和现实关切性，导致理论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而是在既有的水平上不断地重复（从业者努力→工作成果）。对论文发表的追逐与推崇促使各高校推出一系列与论文成果相挂钩的奖励方式（工作成果→奖励结构）。以论文数量和等级为主的奖励结构实际上背离了科研为主的愿景，使科学研究陷入了“虚假的繁荣”（奖励结构→愿景目标），学术域内过度竞争效应显现。	⑤ $C_3 \rightarrow D_3 \rightarrow E_3 \rightarrow A_3 \rightarrow C_3$	工作成果 精细化
第⑥阶段推崇实证研究主导的愿景目标，攀比国际顶级期刊发表。片面强调论文等级而轻视研究实质性内容的奖励结构吸引了一大批年轻学者加入（奖励结构→同仁群聚），加之软科学对中国国内商学院排名的标准中，英文期刊要高于中文期刊一个等级，学者们开始“孜孜不倦”地追求国际顶级期刊的发表。在国际顶刊上发表文章成为学者们的共同追求（同仁群聚→愿景目标）。由于教学只占绩效考核的极小部分，高校教师不遗余力地追求国际期刊发表，教学任务不断被边缘化（愿景目标→从业者努力）。激烈的竞争对奖励结构的不断升级提出了迫切的需求，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从业者努力→奖励结构）。由此形成了“攀比式”发展的恶性循环，真正有意义的研究越来越少。	⑥ $A_3 \rightarrow B_4 \rightarrow C_4 \rightarrow D_4 \rightarrow A_3$	愿景目标 科学化
第⑦阶段唯论文式筛选，精准区分，“非升即走”。在激烈的竞争中，学者们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激增（从业者努力→工作成果）。随之而来的是学术界陷入了“超竞争”的状态，奖励结构依据论文数量和等级划分得更加细致以提高筛选度（从业者努力→奖励结构）。高度细分的奖励结构和唯论文导向的高额奖励吸引了更多致力于顶刊发表的学者加入学术界（奖励结构→同仁群聚）。由于资源和职位有限，新加入成员与现有人员之间产生了更为激烈的竞争，使得从业者不得不加快论文撰写的步伐（同仁群聚→从业者努力），最终形成“水涨船高”的不可控状态。	⑦ $D_4 \rightarrow E_4 \rightarrow A_4 \rightarrow B_5 \rightarrow D_4$	奖励结构 制度化
第⑧阶段同质化，生产大量低水平成果。随着致力于顶级期刊发表的同仁聚集，发表顶级期刊的难度增大，学者们开始转向普通的期刊发表，甚至为了“发表而发表”（同仁群聚→愿景目标）。原本注重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变成了只注重论文发表数量的“科研民工”。青年教师分化，小部分主攻高质量论文发表，承受着巨大的发文压力；大部分年轻博士则通过论文数量的积累进入高校，由于晋升无望而趋向于“躺平”（愿景目标→从业者努力）。他们大多聚焦于那些能快速发表的主题，虽然有少数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绝大多数仍然是以“数量”取胜的低水平文章（从业者努力→工作成果）。这些良莠不齐的成果抑制了开展原创性、负责任研究的同仁的加入（工作成果→同仁群聚）。	⑧ $B_5 \rightarrow C_5 \rightarrow D_5 \rightarrow E_5 \rightarrow B_5$	从业者努力 同质化
第⑨阶段合作伙伴，打造共创事业的学术共同体。面临域内过度竞争，学者们开始在各种学术交流场合反思该如何跳出“自我编织的藤笼”，促使奖励结构由注重期刊等级和数量向奖励高质量研究转变（工作成果→奖励结构）。少数学者在反思中觉醒，协力摆脱“零和”博弈困境，为此他们建立了各自特色的学术生态圈，共同探讨管理研究范式的转型（奖励结构→同仁群聚）。这些学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合作，建设共创事业的学术共同体，打造一个鼓励良性竞争、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生态（同仁群聚→愿景目标）。愿景目标的转变对工作成果质量的优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愿景目标→工作成果），志同道合者自主集聚成各种学术社群。	⑨ $E_5 \rightarrow A_5 \rightarrow B_6 \rightarrow C_6 \rightarrow E_5$	同仁群聚 伙伴化

续前表

关键证据	系统要素间关系形态	阶段特征	
第⑩阶段中国特色化，扎根中国、融通中外。注重高质量研究成果的愿景目标使得顶刊编辑部和从业者不断反思如何构建良好的学术生态。2020年《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发表声明，反对脱离实践、片面追求研究方法的新颖与复杂的“唯定量倾向”，“摒弃数学化、模型化倾向，做真正负责任的研究”。在这种愿景下，科研人员朝着负责任的研究方向努力（愿景目标→从业努力），不断探索如何发表对中国学科发展、反映中国企业实践的中国特色学术论文（从业努力→工作成果）。与质量得到优化的研究成果相对应的是关注成果本身而不是所发表期刊等因素的奖励结构（工作成果→奖励结构）。这种奖励结构与正处于转型中的愿景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奖励结构→愿景目标），由此加速了优质研究成果的形成过程。	⑩ $C_6 \rightarrow D_6 \rightarrow E_6 \rightarrow A_6 \rightarrow C_6$	工作成果中国化	学术域内竞争常态化
第⑪阶段树立学术自信，以本土原创性学术成果来平视世界。注重高质量论文的奖励结构吸引和筛选出真正有志于科学研究的青年才俊加入研究队伍中（奖励结构→同仁群聚）。随着研究队伍的扩大，做好本土特色科学研究、提高学术质量、增强学术自信这一愿景目标逐步得到加强（同仁群聚→愿景目标）。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① 科研工作者成为践行和领军学术自信、文化自信的行动者（愿景目标→从业努力），奖励结构中“五唯”导向渐行渐远（从业努力→奖励结构）。打造学术自信成为中国学术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⑪ $A_6 \rightarrow B_7 \rightarrow C_7 \rightarrow D_7 \rightarrow A_6$	愿景目标价值化	
未来将跨入第⑫、⑬和⑭阶段，各阶段成者特质得到更新。其演化的过程及阶段性产物将分别表现为： 第⑫阶段树立学术自信的从业者不断产出顶天立地的研究成果，由此使既有统一的薪酬结构更新为个性定制、量身定做的类型化奖励结构（A_7）。 第⑬阶段志同道合的同仁齐心构筑注重学术自信的愿景目标，带动从业者以自己的兴趣和独特能力为出发点采取个性化、异质化行动，本着对学术本身的热爱和执着开展切实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工作（D_8）。 第⑭阶段有实质性贡献的优质工作成果通过类型化奖励结构，使同仁们变成休戚与共的学术生态参与者，形成共生化同仁群聚（B_9）。	⑫ $D_7 \rightarrow E_7 \rightarrow A_7 \rightarrow B_8 \rightarrow D_7$ ⑬ $B_8 \rightarrow C_8 \rightarrow D_8 \rightarrow E_8 \rightarrow B_8$ ⑭ $E_8 \rightarrow A_8 \rightarrow B_9 \rightarrow C_9 \rightarrow E_8$	奖励结构类型化	未来趋向

四、研究发现

基于跨时期“逐项复制”逻辑，本文对中国管理学界学术生态12个阶段演化特点及整体轨迹进行了历时性考察，探究了学术生态各要素在互动过程中取得动态平衡的内生动力机制，并识别了各阶段循环所形成的系统状态以及特定元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从以上提炼的学术域内竞争阶段来看，过度竞争只是学术生态发展的短暂性产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系统各要素实现了质变，由此展现了“关系—过程”视角下学术界的自演化和螺旋式发展轨迹。

（一）学术生态系统是一个促进与制约关系并存的稳定（负反馈）的四元循环

研究表明，演化过程每个阶段都呈现异质但同构的闭合循环结构，表现为“3生（+）1克（-）”关系交织的系统。以学术生态阶段③中同仁群聚（B）和从业努力（D）二者的关系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482页，人民出版社，2023。

为例：有一定数量的同仁们集聚为社群，会产生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这无异于内置了一种“相克”关系，促使现有行动者做出更出色的工作成果，以便于在潜在同仁陆续加入、生态密度不断加大的竞争环境中能够胜出或不被淘汰（ $B \longrightarrow D$ ）。同时，因为有了一定数量的同仁，才能够在切磋与磨合中形成某种共同的愿景，引导现有行动者的所思所为，这点表明了间接“相生”关系的存在（ $B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D$ ）。在B与D的关系之中，若同仁群聚过高，会因为“克”强于“生”而导致域内过度竞争，反之，如果同仁过度稀少，则难以形成有影响力的社群愿景目标，既有从业队伍也势必难以保持下去。在一个系统中，所有相关组元间“生”与“克”关系的强度对比，决定了这一系统是处于进化还是退化状态。该阶段早期以 $B \longrightarrow D$ 为主， $B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D$ 较弱，但是因为紧接着有了 $E \longrightarrow B$ 对 $B \longrightarrow D$ 的抑制，所以会形成生、克力相适配的四边形负反馈循环结构。该四边形构成了教研结合型专家的成长机制，可以稳定地生成焦点主体。本文发现的另一个重要关系是，对B施克的E，是D的派生物（ $D \rightarrow E$ ）。E的作用类似于D采取的“假手于人”方式，使对D施克的B也受到克制，即施克者被克，从而构成始于B又终于B的一个四元循环。

（二）学术生态演化是时间与空间交互的过程

学术生态四元循环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敞开的对象是演化历程中的未涉者^①，作为“背景”进入五元系统的视阈中。四元循环视角中不能无视当下不在场者，因为其也是一种存在（“无”其实也是实存的、隐未显见的）。特定循环的成者，即显现的存在，总是意味着系统组元在当期循环中所占有空间的不断扩展。例如，阶段⑤循环所处的空间，相比阶段④的空间增加了组元D。该要素在阶段⑤的角色是中介者，但在阶段④则作为隐而不见的未涉者，再往前溯，会发现它是阶段③的成者。在时间维度下，组元D的角色在③~⑤阶段由成者（显）退场为未涉者（隐）之后，接着又以中介者（显）入场，并在后续的⑥~⑧阶段循环中依次变更为催化者、生者，尔后复归成者的角色。^②成者变为未涉者，这一退场就使得各阶段的循环仅展现为四元闭合的负反馈过程，这是（子）系统稳定性的来源；然而，因为退场的未涉者会紧接着重新入场，之后又复为成者，这样就在空间上扩展为五元系统的循环反复中，确保了整体的发展。由此可见，在当期以四元循环表现为稳定状态的系统，假如摈弃静态解释的立场而以时间与空间融合的视阈来考察，会呈现出显与隐之间交互作用的动态平衡性。学术生态演化的过程，清晰展现了时间维度的展开如何与空间的扩展和要素特质的更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三）学术生态四元循环通过“否定之否定”机制实现五元系统的闭合

前、后循环的成者之间恰好体现阴与阳之间的矛盾对立统一关系。图2是基于图1的四元循环框架，对管理学界学术生态中各要素之间关系进行两个阶段各别分析后再叠加而得的总体结构图。

图2中阶段④与阶段⑤是两个接续出现的四元闭合循环，其对立关系体现在：阶段④作为先前循环，是以组元B为生成目标，组元D是未关涉的隐者；阶段⑤作为后继循环，以组元E为生成对象，组元B则成为未关涉的。成者的角色，是在各阶段不断地演替，且以先前成者的“隐”作为后继成者的背景。依照中国道家核心代表人物老子的“负阴而抱阳”之说，前、后阶段出现的成者B和E，分别是同一整体系统中“阴”与“阳”两面的对立物。在动态的演替中，阶段④的组元B进入阶段⑤后被组元E接替作为新的成者，但紧接着它自身又在阶段⑥转变为被组元C接替。就系统在特定阶段的生成目标究竟是哪一组元来说，成者的位置是沿着持续被“否定”的轨迹不断变换的。这些性质不同的成者在不同阶段顺次生成，可以避免彼此的冲突与能量竞争。与此同时，

① 当下缺位的、未明显参与当期生成过程的要素。

② 此处仍以D要素为例说明其角色的演变历程，其他要素类同于此。某一要素在特定阶段循环中发挥作用的性质（正向/负向关系）需要根据其所扮演的角色来判定。围绕焦点要素的关系者，具有生者、被生者、克者和被克者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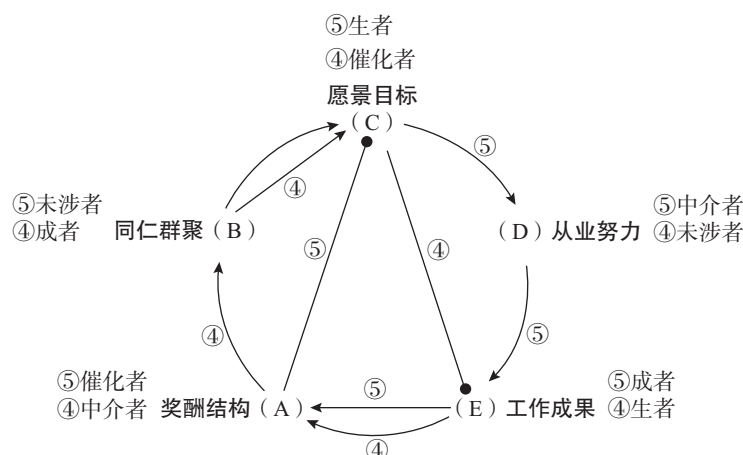


图2 由双四元闭合循环交叠而成的五元超循环系统及组元角色的阶段间比较

前后阶段成者之间又体现出对立物之间共存于一体的统一性关系。也就是说，后继循环（阳循环）与先前循环（阴循环）是动态连接的，而不是无关、并行的。后继循环通过交叠区域（以ECA为顶点的三角形）对先前循环进行承合，为阳循环“汲取”阴循环的能量提供了渠道，由此在阴阳复合中“辩证式”耦合前行^①，使得由多个四元循环连接而成的整体系统具有“自演化”的内在动力。^②

按照历时性研究中跨时期逐项复制的逻辑，任意前、后两个四元循环的后继成者总是对先前成者的否定，然后再被下个阶段的成者所否定。图2显示，整体系统只有相对比较少量的5个组元，即构成简洁性，尤其是每个阶段只需关涉四元就可以形成闭合的循环。但是，在各阶段同形的循环结构这一表象背后蕴涵着一股内在驱动力量，即在部分重叠的双四元循环中形成了体现“动态复杂性”的辩证式连接，其递进演替的过程本质上都是后者以否定方式不断地对前者进行扬弃，经过五个的四元循环之后复归起始点，形成超循环性质的五元系统。^③在五元超循环系统中，先前四元循环中的生者（如图2的组元E）会在后继四元循环中转为成者，这是组元间相依关系的体现，意味着先利他者将在下一阶段也使自己获利的系统统一性。既否定又相依，表明由五元要素构成的超循环系统具有各元竞合共生、良性循环的特性。

（四）在螺旋式发展的学术生态系统中过度竞争化是变迁过程的一个短暂性产物

与传统的“正、反、合”三段式不同，我们发现“否定之否定”是不断持续下去的。其中，由于当前的成者总是对前期成者的否定，因此，如果把B作为当前循环的成者，蕴含了对前置成者(D)的否定，所以是第一次否定；由“正”至“反”，这是周期性循环中第二次的“否定”；继“正、反”之后生成的组元，在性质上是近“正”者而克“反”者，所以将第三次“否定”称为“转”；而“转”之后的四元循环过程是生成居于“正”与“反”两极之间的特质混合者，故称第四次“否定”为“合”；第五次否定，使得D由生成B时的被否定（不在场，隐）变成新一轮循环的

① A. H. Van de Ven. "Engaged Scholarship: A Guide for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J. E. Henkel. "A Treatise on Efficacy: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Thinking by François Jullien, Janet Lloyd",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004, 33: 183 - 186.

③ 艾根和舒斯特将“超循环”定义为由若干子循环构成的更大的循环。图2显示，五元系统内部相关要素间以阴与阳循环继起方式动态连接的过程模型，在形式上就表现为这样一种“超循环”。参见 M. 艾根、P. 舒斯特：《超循环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成者（在场，复现），所以称为“复”。这样整体系统经过5次四元循环之后，便完成了一个周期为5的完备循环，也就是五元系统实现了螺旋式的闭合，即起点与终点重合但所有组元都发生了一次质变，系统获得整体的更新。本文把整体系统实现闭合的五个负反馈循环，依序称为“正、反、转、合、隐/复”。这五个过程叠加，便构成了一个由持续“否定”机制自我驱动的学术生态发展轨迹。在螺旋式发展中，由于同仁群聚过密而产生的过度竞争化，是一个阶段性产物。也就是说，虽然过度竞争化是以一个必经的阶段，但是可以在“否定”机制的作用下迅速跨越。

图3刻画的是由阶段④~⑧这5个四元循环依序连接而成的五元系统，其序列关系[D]—B—E—C—A—D表明系统各要素作为不同阶段的成者分别获得了特质更新。如图3所示，D由隐而复，代表从业者的努力从“同质化”变为“异质化”，生态系统向上旋转了一圈，形成五元闭合的螺旋式演化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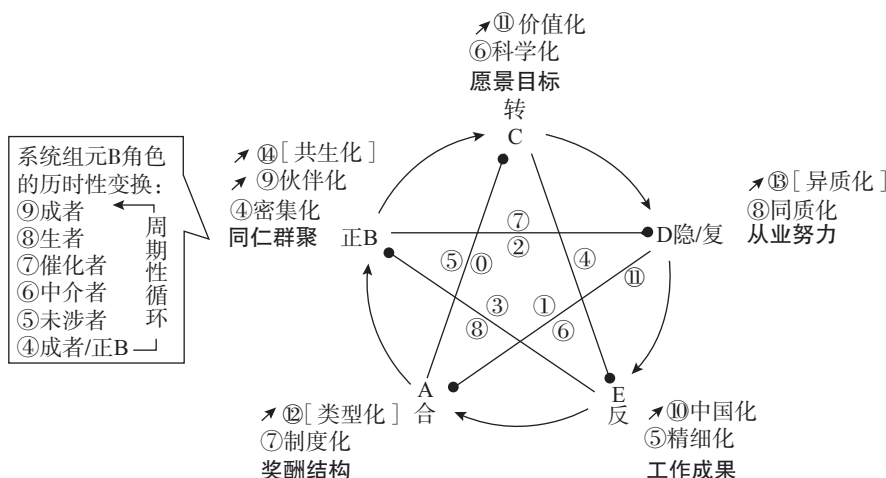


图3 学术生态系统五维构成空间与生成过程分层示意

其中：↗表示“成者”特质的变化，[]表示趋向性或预见性的特质更新；图中部四元循环闭合的“克线”旁所标数字，表示不同阶段出现的次序；两线交叉处有“截断”标识的，代表其次序相对在先（位于底层）；图外圈以数字标序的汉字和字母，表示该要素对应应在阶段④~⑧为周期的各次四元循环中作为“成者”的次序。

进一步，若沿着时间线向前及向后推演，如前面的过程分析所表明的，会形成一个更完整的生成序列，即 $E_0-C_1-A_1-D_2-B_3-E_3-C_4-A_4-D_5-B_6-E_6-C_7-A_7-D_8-B_9$ 。这个扩展的序列，如隐去时间线，那么便在图3这样的空间图示中呈现出阶段⑤与⑩⑩、④与⑨⑭、③与⑧⑬、②与⑦⑫、①与⑥⑪的复现，而其数字之差为5，就表明由5个四元循环的子过程（即“行”）构成的系统是一个“五过程”系统。可见五过程结构图是一个内蕴时间线的动态过程框架，刻画了一个由五个基本过程构成的五元闭合的整体循环体系。

五、理论贡献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通过历时性分析揭示了过程哲学所阐述的变化过程律则。过程哲学认为当下的“存在”是动态过程中的短暂性产物，应该通过要素间的复杂异质性来找到事件发生中的生成力。通过对学术生态发展的考察，本文一方面例证了过程哲学中的短暂性“存在”的含义，从绵延的历史进程来看，任何“成者”，不论其成为“存在”的具体时点如何，都是以矛盾统一体的形式成为当下的

“短暂性产物”^①。也即，学术生态发展的每个阶段对于整个学术界都是暂时性存在，例如第④阶段生成的同仁跟进 B 意味着域内竞争强化，但是这一态势是短暂性的，进入第⑤阶段后又被该阶段生成的工作成果 E 所否定，或者 B 由前一阶段的“存在”变成下个阶段的“隐在”，因此是系统发展的阶段性产物，表明时间性、过程性是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本文深入揭示了与“存在”对应的“隐在”的内涵，如何作为事件发生中的生成力。某时刻不在场、被忽略的要素可能是一种建设性否定^②，能够促进新特质的生成。这与中国道家关于“无”亦是一种“有”的观点不谋而合。某要素新特质生成之后会进入暂时被搁置的状态，这一阶段的“否定”，使得系统可以腾出能量来助推或加速与“不在场”者性质上相悖的要素（即对立物）生成新的特质，因此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此外，当下循环中总有某特定要素“不在场”，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过程机制，其存在不仅佐证了“建设性否定”观点的适切性，同时也说明时间线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析维度。

第二，拓展了有关域内过度竞争现象动态性的形式理论。实质理论是针对特定情境下出现的某种具象化现象提供的一种专有性解释，在议题领域和结论适用范围上具有限定性，且通常以实体为对象进行横断面、共时性的解释；形式理论是针对研究对象总体得出的普遍性结论或基本原理，可用以指导和启发同类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因此是一种“元”理论。分析过度竞争化之中一个具有动态性的过程概念，剖析其内在动因及解决之道无疑需要在多主体互动的空间维度之外引入“时间线”，使演化过程及动力在历时性研究中得到有深度且与现实相契合的诠释。本文采用“关系—过程”视角，通过对学术生态系统多元要素之间主动或被动的生（正向）与克（负向）关系的组合分析，构建了一个融合空间和时间维度的“五过程”理论模型。每个阶段之内生成特定成者的循环过程是同构异质的四元（子）系统，通过五个阶段叠加的接续过程，在“汲取式前行”方式的跨阶段连接中形成五元整体系统。这一过程模型具有形式理论的价值，启发我们从整个系统演化角度来解释域内过度竞争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动态过程。参与者个体感知的过度竞争其实是生态系统整体在连续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短暂性产物，是事物发展中必经但可以跨越的阶段，而非恒久的“锁定”。

第三，拓展了黑格尔的三段论，揭示了中国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深刻内涵。黑格尔创立的“正、反、合”三段论，在讲对立统一规律时只讲“对立”，不讲统一，且侧重从“一分为二”的角度说明矛盾存在于事物的内部，而不讲“合二为一”的矛盾特性，且“三分形式的情结与追求，出自其建立唯心主义绝对真理体系的需要，并非为了变革社会的实践。因此，这里有许多牵强附会和生拉硬扯的拼凑”^③。马克思和恩格斯结合工人运动把黑格尔唯心体系改造成唯物辩证法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不断地进行中国化，以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正如习近平 2016 年 5 月 17 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④，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数理哲学家王俊龙承袭波普《什么是辩证法》的观点，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三段式”虽然“在哲学思辨上是一种进步但在逻辑上尚不完善”，特别是忽略了“‘分’作为‘合’的对立面的先在性”。^⑤我们发现，在“反”与“合”两个阶段之间存在一个“转”的阶段，其属性接近于“正”而对立于“反”，因此是一个分立的阶段。本文所识别的包含“正、反、转、合、隐/复”五个过程的持续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机制，与中国传统过程哲学思维的主张相呼应，是在承袭中华民族文化中对既有辩证法思想的补充，也是构建中国特色

① A. Langley. "Process Thinking in Strategic Organization". *Strategic Organization*, 2007, 5 (3): 271 - 282.

② 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③ 彭燕韩：《论黑格尔辩证法体系的缺陷与中国特色辩证法体系的创新》，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6）。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484 页，人民出版社，2023。

⑤ 王俊龙：《太极数理哲学：身心统一的世界观》，载《学术月刊》，2013（6）。

辩证法体系的一次尝试。

将辩证法原理理解为持续的否定,那么,“正”“反”之后紧接的“转”,反映了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对立统一;随后出现的“合”,即对“转”作为“反”之否定者的再否定,也体现了“正”与“反”这对初始矛盾体的统一。尔后,“复”中类似的“合”逻辑伸展到实现“转”与“合”这对新的矛盾体的统一。而这一周期的结束,系统便进入新一轮的“五过程”大循环或超循环。这个过程起始于系统组元之间生(促进)与克(制约)关系的共存和交织,短暂地“终”于特定组元的特质更新。源自生与克这对关系悖论所产生的演化动力,为解释复杂动态现象提供了一种过程理性,有助于深入学术生态演化的“现实”中去探究内含五个过程的整体系统如何实现螺旋式发展。这是一种富含整体性、动态性和辩证性思维的过程理性,有别于因素理论视角下的实体理性,后者以西方主流的实证研究范式为代表,过度依赖还原性、静态性及线性的思维。

第四,深化了源自西方的关系论研究,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古今会通。从与西方关系论对话的角度来看,“关系社会学”强调关系体中关系者与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进而建立基本分析框架。^①此后,以关系为本体、强调过程观的研究开始出现于社会学领域,并带动了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范式转型。有学者认为,关系社会学更加适合分析中国本土情境特征,并倡导建立中国特色的关系社会学。^②应当说,关系社会学和关系实在论为多个学科领域奠定了关系性研究的逻辑基础和思想指引。然而,一个欠缺之处是,在关系性与过程性结合的研究上,除了哲学领域理论性探讨之外,迄今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缺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虽然提供了系统要素间关系的一般化说明,但是忽视了系统所经历过的、在所处环境影响下呈现的某一个确定的发展顺序。而阐明这样的时间顺序,是过程性研究的重要问题。^③本文通过体现整体观和动态观的五过程模型,对学术生态这一关系体的构成要素进行生与克关系及其结合的关系性研究,使复杂系统演进过程得到具体和较深入的揭示。这不仅呼应了西方学术界“关系转向”思潮,而且对曾国权提出的关系动态理论框架^④进行了细化与深化。通过借鉴社会学领域中结构功能主义对社会结构和演进过程的既分化又关联的分析,对新制度主义关于“间断式均衡”变迁过程^⑤的研究从演进路径特征的角度进行了拓展。

第五,从本土理论构建的角度看,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辩证矛盾思维的中国化。正如熊铁基所认识到的,“在大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比起儒家思想,我们对道家思想的研究相对少一些”^⑥。辩证矛盾思维是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中影响最大的一个部分,需要在古今中外文化交融中得到应用与拓展。以道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深蕴整体观和过程观,与唯物辩证法分析思路高度契合,能够对“中国式转型”现象提供有力的本土化解释。这不仅有助于增强本土研究者的理论自信,也为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找到了可证伪、可操作化的经验事实。特别是,作为道家哲学的一大核心思想,“五行学说”长期没有在学习层面上得到阐释与应用,以致与或许以另一种(转型的)科学范式可以进行理论化建构的研究创新(突破性创新)机会“失之交臂”,造成哲学思想与科学逻辑的割裂。本研究尝试从“关系—过程”视角对域内过度竞争形成动因与过程展开历时性研究,为将“五行说”打造为一个具有科学性和中西对话可能性的过程理论化(区别于

① M. Emirbayer.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 103 (2): 281-317.

② 边燕杰、杨洋:《作为中国主体话语的关系社会学》,载《人文杂志》,2019(9)。

③ A. Langley. “Process Thinking in Strategic Organization”. *Strategic Organization*, 2007, 5 (3): 271-282.

④ 曾国权:《“关系”动态过程理论框架的建构》,载《社会》,2011(4)。

⑤ S. D. Krasner. “Approaches to the State: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1984, 16: 223-246.

⑥ 熊铁基:《重视对道家思想中生态智慧的研究》,载《人民日报》,2018-07-24。

因素理论化)科学知识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研究证据。

我们提出几项政策建议：

第一，倡导关系思维，全面认识关系的性质、方向和组合性。具体而言，若想解决学术域内过度竞争问题，必须意识到要素间生克关系的同时存在。片面强调同仁群聚及形成的社群密度对从业努力的制约作用，一味地降低同仁密度（同仁群聚——从业努力），或许就丧失了促进现有人员良性互动的渠道（同仁群聚→愿景目标→从业努力）。同样，只看到同仁群聚通过愿景目标间接催生从业努力的正向作用而过大地增高社群密度，或许会引发恶性竞争，从而不利于现有人员的健康发展。因此，要在对要素间关系的全局性认识的基础上，构建生克力相适配的负反馈循环结构。

第二，秉承时间性和过程性思维，探索四元循环之间的转换机制。学术生态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应该引入时间性和过程性思维，而不是以静态的思维孤立地看待每个阶段。“工作成果→奖励结构→同仁群聚→愿景目标——工作成果”结构，是一个四元负反馈循环结构。以本文提炼的演化过程逻辑来解读，其稳定性有余、发展性不足，根本原因是缺乏对该稳定循环加以相克的另一个循环。为发表而发表的“旧式”愿景目标，会带来同仁大批跟进（B）产生的过度竞争。反之，把创新作为创造学术价值的手段去追求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发表，如此重塑后的愿景目标的作用就由以克为主转为以生为主，从而在跨阶段转换中促进高质量工作成果（E）的生成。

第三，注重发挥外部力量对学术生态的推动作用。虽然学术生态系统内在地具有通过自组织实现螺旋式发展的动力机制，但这只是趋向性、规律性的进程，可通过外部某种力量的干预以加速达到未来的理想状态。“现实”是“实存与本质的统一”，反映事物“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①。本研究将阐释域内过度竞争产生及消解的过程机制归纳为“否定之否定”，是对这一“必然性”律则的提取与凝练表达。基于这一跨阶段辩证式连接的律则，可以预见“奖励结构”由大一统转向类型化，契合了中国先贤以“道一而理多”处理不变性与响应性悖论的制度建设理念。^②

当然，转向类型化的过程是系统发展到当前阶段所指向的一个潜在的变革方向。由潜在变为现实的进程或快或慢，需要系统外部力量的加持。学术管理部门和相关机构要建立健全人才长周期评价和研究成果分类考核、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管理制度，制定并实施以事业为导向和能力发挥为本的奖励结构。不妨借鉴军队中构建“假想敌”式的蓝军路径^③，在部分高校奖励体系中小范围地试验、培育一个激发学术创新的奖励系统，作为现行考核体制的试验。通过两种奖励体系下学术生态发展差异的对比，可以刺激学术界及管理部门不断反思、改进，增强学术生态系统在复杂动态环境中的活性与延展性。

六、结语

域内过度竞争的产生与消解是一个彰显复杂系统内生动力机制形成与作用的动态现象。以中国管理学界发展历程为对象的过程研究表明，学术发展实际上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学术自信的研究者，需要从要素间的关系入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通过中国独有的智慧与思维来直面和反思当代实践中出现的难题，从而避免陷入“怪圈”式发展轨迹。

我们以深蕴整体观、动态观和辩证观的中国传统过程哲学思维为根基，从动态复杂系统各组元作为特定阶段“成者”依序取得特质更新的过程分析中，总结提炼出了“成者”之间“克者被克”

① 吴晓明：《论黑格尔对形式主义学术的批判》，载《学术月刊》，2019（2）。

② 周炽成：《法家的道理之论：从管子到韩非子》，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王凤彬等：《制度不变性与响应性的悖论——“德治”与“智治”两种组织治理模式的对比》，载《中国软科学》，2011（11）。

③ 孙黎：《蓝军战略》，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的过程机制。这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倡导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个应用，另一方面也为帮助和激发现有从业者通过始于当下的“吃螃蟹”行动，带动更多同仁立足本土话语体系进行理论构建和增强学术自信。

本文丰富和深化了过程研究范式的理论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对当代中国管理难题的解释和指导意义，是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过程哲学思维相结合的一个尝试。相对于中国实践取得的重大成就，中国本土理论构建还很不足。^① 中国学术界要摆脱社会科学领域对西方实证研究范式的依赖和因循状态，需要扎根中国大地，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为己任，将中国文化核心概念融入直面当代实践问题的学术研究中，切实通过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从而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目标的实现。

The Evolution of the Academic Ecology of Chinese Management: A Diachronic Study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cess Theory

WANG Fengbin¹, AN Baiyu¹, LIU Lulu², LI Bin³

(1. Business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 School of Labor Relations and Human Resources, 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

3. School of Tourism Scienc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How to eliminate excessive competition within a field and promote substantive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s attracted wide scholarly attention recent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plex academic ecosystem model including multiple agents and then analyzes the causes of excessive academic competition as well as the sol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ality-process theory. The analysis on the diachronic process of the management of Chinese research field shows that an academic ecosystem is governed by the self-organizing process that spontaneously generates order. The interac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four system components constitutes a negative-feedback mechanism that facilitates the formation of current stability for the whole system. When the hidden-fifth element takes the turn as the target of “becoming” in the recursive process of generation, the academic system achieves a spiraling development in future. By appl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of process deeply rooted in its holistic, dynamic, and dialectical thinking to explain the dynamics of excessive competition within the academic field of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processual mechanisms of the excessive competition.

Key words: Management philosophy; Academic ecosystem; Evolution; Process philosophy; Diachronic study

(责任编辑 林 间)

① 冯颜利：《新时代哲学的使命：范式创新、思维革命、方法论自觉》，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6）。